

China Labor Economics

(2005 Vol.2 No.3)

中国劳动经济学

2005年第2卷

3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组织编写

如何集成对劳动力流动的多学科研究

人力资本动态积累与经济增长

教育与就业关系研究

加工贸易和中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有权益阶层与无权益阶层的抗衡：

寻求就业与政府干预

全球化与“民工荒”：一个宏观解释

上海地区外来劳动力问题之研究

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机制研究——以东莞为例

蔡昉

陈仲常 丁从明

吴永球

林松华

宋丽娜 Simon Appleton

王德文 蔡昉 高文书

封进 许庆

张建武 宋国庆

China Labor Econom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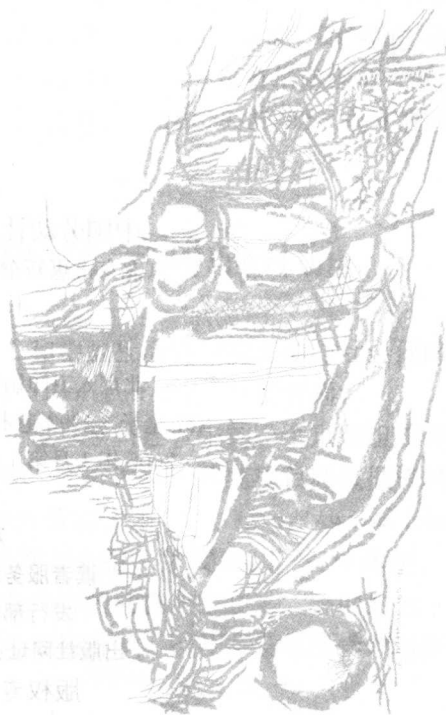
(2005 Vol.2 No.3)

中国劳动经济学

2005年第2卷

3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组织编写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劳动经济学. 2005 年第 2 卷第 3 辑/王德文, 张建武, 都阳主编.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6

ISBN 7-5045-5418-9

I. 中… II. ①王…②张…③都… III. 劳动经济学-中国-文集 IV. F2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0984 号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惠新东街 1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出 版 人: 张梦欣

*

北京人卫印刷厂印刷装订 新华书店经销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1.5 印张 269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4000 册

定价: 20.00 元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64929211

发行部电话: 010-64911190

出版社网址: <http://www.class.com.cn>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4911344

中国劳动经济学

China Labor Economics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德文 张建武 都 阳

学术委员会主任 蔡 昉

学术委员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鲁 王延中 孔涇源 左学金 田小宝

白南生 朴之水 (Albert Park) 刘燕斌

苏海南 李 实 李永杰 李培林 杨云彦

杨河清 杨宜勇 何 平 宋洪远 张车伟

张俊森 陈金永 (Kam Wing Chan)

金喜在 孟 昕 赵耀辉 胡鞍钢 姚先国

袁志刚 莫 荣 葛 强 (John Giles)

曾湘泉 蔡 昉

目 录

主引导读	王德文 (1)
------------	-----------

专 文

如何集成对劳动力流动的多学科研究	蔡昉 (3)
------------------------	----------

论 文

人力资本动态积累与经济增长	陈仲常 丁从明 (13)
教育与就业关系研究	吴永球 (25)
加工贸易和中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林松华 (44)
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有权益阶层与无权益阶层的抗衡：寻求就业与政府干预	宋丽娜 Simon Appleton (63)
全球化与“民工荒”：一个宏观解释.....	王德文 蔡昉 高文书 (82)
上海地区外来劳动力问题之研究	封进 许庆 (100)
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机制研究——以东莞为例	张建武 宋国庆 (119)

经典文献

劳动供给、家庭和贫穷：S形劳动供给曲线	Maryke Dessing (139)
---------------------------	------------------------

文献综述

低工资时向下倾斜劳动供给曲线文献综述	郭继强 黄志岭 (164)
--------------------------	-----------------

Contents

Editors' Introduction Dewen Wang (1)

Special Article

How to Synthesize the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on Labor Mobility? Fang Cai (3)

Papers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 Zhongchang Chen Congming Ding (24)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Yongqiu Wu (43)

Processing Trade and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Songhua Lin (62)

An Investigation into Government Job-Search Interventions in Chinese Labour Market
..... Lina Song Simon Appleton (81)

Globalization and the Shortage of Rural Workers: A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
..... Dewen Wang Fang Cai Wenshu Gao (99)

A Study on Migrant Labors in Shanghai Jin Feng Qing Xu (118)

A Study on the Employment Choice Mechanism of Rural Labors in Dongguan
..... Jianwu Zhang Guoqing Song (138)

Classic Literature

Labor Supply, the Family and Poverty: the S-Shaped Labor Supply Curve
..... Maryke Dessing (163)

Literature Review

A Review of the Downward-Sloping Labor Supply Curve at Low Wage
..... Jiqiang Guo Zhiling Huang (176)

主 编 导 读

王德文

劳动经济学是关注现实民生问题的一门经济学。它的众多研究命题,如工资和就业问题、收入问题、教育问题、劳动力流动问题、歧视问题等等,都是用来解释这些命题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成因或趋势。本集收录的10篇文章,都是从理论上或经验上紧扣这些问题,对现实民生问题的探讨。

《如何集成对劳动力流动的多学科研究》是蔡昉先生为《中国转轨时期的劳动力流动》一书所作的序言。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一篇综述性的序言,不如说是一篇高屋建瓴的引领。文章指出,在经过了前期“摸象”式的专题研究阶段之后,中国劳动力流动研究进入了综合性的研究阶段,面临前所未有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呼唤着多学科之间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交流、对话与合作,实现集大成的理论创新目标,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

《人力资本动态积累与经济增长》是一篇分析人力资本动态积累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文章。人力资本积累是家庭的投资决策行为。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选择既体现了代际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经济中人力资本增长率及相应的经济增长率。当经济面临着同样的外部冲击时,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在不同收入水平下会有不同的行为反应。人力资本的动态积累可能存在趋同或阈值的两种效应,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会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也就是说,贫困家庭和落后地区具有更大的脆弱性。

《教育与就业关系研究》探讨了教育与就业之间复杂的传递关系。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将教育发展过程分解为教育结构变化与教育总量扩张两个方面,分析它们各自与就业之间的关联性、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文章利用我国经验数据研究发现,我国教育发展总体上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但教育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如初中教育程度的比重上升会对就业水平产生消极影响、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群体的比重变化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不显著,等等。

《加工贸易和中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考察了国际贸易,尤其是加工贸易对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和就业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是这个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在过去二三十年里,贸易自由化使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现象。发达国家的国内收入差距一般表现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收入差距则通常表现为地区之间的差距。中国的经验分析表明,对外开放在促进就业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拉大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收入差距。

《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有权益阶层与无权益阶层的抗衡:寻求就业与政府干预》是一项很

有意思的研究。作者选择进城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两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特殊群体进行对照,旨在检验农民工是否在求职与报酬方面受到歧视。如果这两个群体的求职与报酬只由他们的生产能力而非户口状况决定,那么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不存在歧视问题。反之,城市劳动力市场就存在身份歧视。城市下岗工人的再就业优先权,反映了进城农民工与城市下岗工人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空间,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身份歧视依然存在。

《全球化与“民工荒”:一个宏观解释》对近年来的“民工荒”现象做了解释。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演了一曲戏剧性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不少研究是从迁移成本和工资水平角度来进行解释。这篇文章则着重从就业机会和地区间比较优势变化来解释这种结构性和地区性的短缺现象。在出口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加速和经济重心转移等经济因素作用下,“民工荒”在出现时间上与中国成为 WTO 成员并非巧合,而是中国国内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映,也预示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转型,即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过渡。

《上海地区外来劳动力问题之研究》是一项就业需求和预测的案例研究。上海市是长江三角洲的经济重心,经济辐射能力很强。选择上海市为例,可以观察这个地区的未来就业增长潜力和需求状况。“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如果继续保持每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本地劳动力显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每年都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缺口,而外来劳动力则可以填补这一缺口,成为上海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源泉。

《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机制研究——以东莞为例》也是一篇案例研究。东莞市是广东省制造业和外来劳动力的集中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东莞农村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外部环境变化和农户资源禀赋的改善,使得东莞农村劳动力就业有了新的选择。作者运用博弈理论,对制度变革与农户参与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就业选择的影响做了尝试分析。

《劳动供给、家庭和贫穷:S形劳动供给曲线》是一篇分析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供给的有代表性的经典文献。作者拓展并综合了经典劳动供给模型,用来解释生存水平下农户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就业策略和劳动供给行为的复杂性。当工资处于生存水平时,家庭次劳力(如妇女)的劳动供给弹性为负,随着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次劳力的劳动供给弹性变为正,由于主劳力的劳动供给弹性在各种工资水平上都接近于零,这样,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农户家庭的劳动供给呈现出 S 形变化轨迹。

《低工资中向下倾斜劳动供给曲线文献综述》是一篇对低收入水平下劳动供给行为的文献综述。我们通常知道有一条后折的劳动供给曲线。当工资水平高到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在上述折点所对应的高工资水平之前,一般假定工资水平上升,劳动供给增加,劳动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然而,在许多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低工资中劳动供给曲线向下倾斜的现象却普遍存在,并获得了理论上和经验性的支持。

如何集成对劳动力流动的多学科研究^①

蔡昉^②

一、劳动力流动研究面临的任务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力迁移和人口流动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社会现象,以及理论界研究和讨论的一个热门题目。归纳起来,迄今为止,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总体描述阶段与专题深入阶段。当劳动力流动突然出现,并构成影响城乡经济的一种重要现象时,理论和政策研究不可避免地即时反映,是对劳动力流动进行一般性的分析和描述。总体描述阶段主要探讨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原因和意义,描述流动劳动力的特征,估计劳动力流动的规模等。这个时期的一个理论特点是,人们尝试把现成的迁移理论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现象相印证。

进一步,当劳动力流动成为一种常态现象时,人们开始从理论和经验两个角度,分专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探讨劳动力流动的经济、社会、人口和地理分布特征,从而扩大了这个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这个时期,研究者们不仅研究流动劳动力本身,而且在他们与城市劳动力的对比中,对城市形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包括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所受到的户籍制度约束、流动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互补及冲突、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城市政府实施的对于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政策、劳动力流动对于迁出地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此外,许多研究者还对在城市中的外来劳动力的特殊脆弱性给予特别关注,并且开始从社会保护的角度考察劳动力流动问题,一个例子就是在研究中加入了性别视角。

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分别有着各自的意义。总体描述阶段的研究,能够使人们对劳动力迁移获得概括性认识,如了解劳动力迁移的原因、劳动力迁移的规模、迁移者的个体特征,以及劳动力迁移的宏观影响等。而在专题深入的研究阶段,人们则试图在对迁移现象有概括性认识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关于迁移现象的各个层面,如迁移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互补及冲突、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作为弱势群体的迁移劳动力以及他们当中的弱势群体、城市政府实施的对于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政策、迁移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影响等。

尽管经过专题深化的阶段,对于迁移问题的研究已经进入到非常细致的程度,使我们对

① 本文是蔡昉为《中国转轨时期的劳动力流动》一书所作的序言,该书将于 2006 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②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于这个主题的各个方面有了更多的知识和理解,但是,这些研究仍然以描述性分析和微观分析为主,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与其更深刻的制度背景之间的逻辑联系上的研究仍显缺乏。也就是说,深入地描述了诸如关于迁移的诸多现象之后,这些现象之间的逻辑联系究竟如何,问题是在什么样的制度背景和发展阶段上产生的,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被解决,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面对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每个单个的研究者有时就像盲人面对大象一样,信息获取能力的局限常常只能允许我们了解问题的一些局部。换句话说,在认识问题的特定阶段上,人们难以把握总体。这种现象是自然的,我们不应求全责备。在奥古斯都时代,罗马人绘制世界地图的方法,是伴随着疆域的扩展而不断完善的。每一支远征部队和探险船队,都按照自己的足迹所及和观察所得,刻画世界的一个特定的部分。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需要有到当时为止可以获得的关于世界整体的知识,才能使每个部分的地图具有整体关联性。随后,还需要有一个集大成者,把支离破碎的局部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画面。

因此,要突破这个阶段,需要把在“摸象”阶段获得的关于大象的局部并割裂的信息,汇总为一个全面的认识,才能孕育出理论创新和认识上的革命。因此,对于中国特定时期、特定制度环境下产生的迁移现象来说,在经过了细致的专题研究阶段后,应该重新回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从总体上把握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即进行总体抽象研究。就好比要编织一张网,需要有节点和纲绳。各个专题研究就是网的各个节点,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纲绳,依靠节点之间的纲绳,就能够织成整张网,纲举目张。

做综合阶段或集大成的工作,在劳动力流动研究领域需要在四个方面有足够的积累性工作。或者说,为了集大成的目的,我们仍然需要在四个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以作为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的先决条件。

首先,要回答的是由谁来集大成。正如 Joseph S. Berliner (1977)所指出的,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偏重于从自己的关注点出发,描述和诠释劳动力流动现象。例如,经济学家关注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学家关注公平问题,政治学家关注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等等。然而,要形成对该领域的集大成,不可避免地需要各个学科的通力合作,但是,怎样进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能够提出的必要条件是各学科提出大致相同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按照自己学科的特点发挥比较优势。而在这个学术的竞争中,那些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并给予理论和经验解答的学科和学者,将历史地承担这个集大成的任务。

其次,是怎样提出问题和提出哪些问题。无疑,集成对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要求各个学科提出高屋建瓴的、正确的并且有针对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一个原则是在工业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考察劳动力流动的地位、作用和前途。这种考察在更加广阔背景下,通过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包括来自工业化国家的一般的经验和中国特色的经验。具体如:劳动力流动的具有共性的规律和中国的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应该怎样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如何预期和判断劳动力流动转折点的到来,这个转折点与工业化阶段的关系如何;迁移能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减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劳动力流动现象与政府发展政策的关系如何,等等。

最后,是需要人们做许多更加基础性的工作。第一个需要是获得关于劳动力流动的更加

充分的信息。Joseph S. Berliner 认为,真正热爱迁移事件本身的是人口学家,他们整理大量的数据,提供正确、准确的信息,使其他学科的研究建立在科学、可靠的基础上。但中国的人口学家似乎并不是研究劳动力流动的主力军。因此,迄今为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①,我们仍然缺乏关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充分、准确的数字和特征性的信息。第二个需要是进一步揭示和提炼能够反映劳动力流动趋势性事实的基本特征。目前,这个方面的工作是最为丰富的,但是仍然有一些研究视角,人们尚未涉及或深入不够。第三个需要是不同学科的有效对话。这是在该领域提出更深层次问题的前提。相对于其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劳动力流动或迁移可以说是吸引了最多学科学者注意力的话题。然而,目前不同学科对于迁移问题的研究还处在“老死不相往来”、自说自话的状态,妨碍了研究的深入。

二、在研究上我们究竟走了多远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关于劳动力流动或迁移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家的贡献是无可争辩的,影响最为深远。如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和托达罗等理论模型,及其围绕这些理论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检验,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最重要的视角,甚至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而在最近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中,发展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问题仍然是经济学的主流话题。与此同时,在劳动力流动或迁移研究中,经济学家继续发挥着主流作用。然而,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几乎很少对劳动力流动进行细致的研究。一方面,社会学家对迁移问题研究的兴趣,远比经济学家表现出的要浓厚得多,发表的成果也更多。另一方面,在经济学家涉猎的范围内,常常满足于就比较宏观的问题发表见解,而缺乏微观的观察和经验性的研究。倒是一些居住在国外的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学者,在这个领域做了较多的工作。

经济学家缺乏对劳动力流动这一话题的兴趣,固然有着充足的理由。在一个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结构变化时不我待、体制改革日新月异的发展时期,经济学家有着太多的短期而紧迫的问题要去关注,以致只好把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作为边缘问题,留给其他学科去研究。然而,对劳动力流动的认识的缺乏,却妨碍了经济学家对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在长期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的地位的理解和把握,造成中国经济学的短期化、世俗化和缺乏历史感的状况。对经济学家个人来说,未能把劳动力流动现象作为自己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红线来把握,也是导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研究中缺乏一致性和系统性的重要原因。

从社会学视角研究迁移问题,无疑是这个领域的研究在中国的特色。这类文献以微观研究为主,揭示了许多关于劳动力流动和流动劳动力的特征性事实,为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然而,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过于微观的研究,往往又造成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的提炼难以达到抽象的高度。例如,社会学对流动人口中弱势群体的关注引人注目,对诸如工伤

^① 按照世界银行专家的说法,中国统计体系的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Ravallion, Martin and Shaohua Chen, 1999, *When Economic Reform Is Faster Than Statistical Reform: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1 (1): 33-56.]

群体、城市乞讨人群、失地农民、女性和儿童的权益、女性生殖健康等角度都有所涉及,表现了一种科学研究中的人文关怀。与此同时,社会学家对流动劳动者主流群体的一般状况、基本特征、变化趋势等,却缺乏系统、实证和宏观的把握,造成所谓研究的“空心化”倾向。这种倾向势必削弱我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过程中最具有规律性的趋势,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演进的认识。

由于缺乏关于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常规统计数据,也由于恰好在转轨时期进行过1987年、1995年两次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人口学家发挥其学科优势,对人口数据中关于迁移和流动的信息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帮助人们增进了对这个问题的定量化的认识。同样,由于统计方法和概念的原因,人口调查和普查数据中描述人口经济状况和社会特征的信息不充分,人口学对于迁移和流动问题的认识通常是游离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外的,没有能够把迁移和流动这样重大的发展现象与中国的发展和转轨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降低了研究的层次,以致这个学科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没有占据主流的地位。尽管如此,人口学家对于特殊流动人口群体的深入研究,抓住了主流研究忽略的一些研究视角,具有不容忽视的贡献。

其他学科如地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其中主要是一些居住在海外的学者,也对迁移和流动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这类研究除了更加关注劳动力流动中的一些冲突现象外,通常没有特别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要么附着在经济学或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上,要么是作为中国学者的一个研究领域。如果说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特点,那就是在海外政治学者对中国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中,往往可以感受到较强烈的批判性,特别是针对政府政策的批评比较尖锐。虽然我们从这种直言不讳的批评中有所受益,但是,过重的感情色彩和不充分的科学分析,常常得出不能令人信服的结论。

上述评价是我个人接触和阅读得到的一些印象,从文献回顾的角度一定难免挂一漏万,对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一些评价,也很可能是错误的。为了给读者更加直接和第一手的信息,我们分5个关于劳动力流动的重要话题,选编了16篇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撰写了6篇综述文章。尽管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不同,有些已经过去许多年,但是,至少在其发表之时,文章的学术性、实证性、研究规范,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力图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有数据意义和方法论意义。文章的选择范围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阅读之后,读者可以得出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在劳动力流动的研究领域究竟取得了哪些成果。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完成该学术领域集大成的历史使命,无疑要以此为起点。

第一编讨论公共政策以及政府对流动劳动力的服务与管理。蔡昉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一文,把城乡收入差距(三农问题)与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进行制度分析,描述了制度变革的临界点,并揭示中国农民推动城市偏向政策改变的机制,即通过“退出”机制也就是“用脚投票”,最终促进制度变革条件的成熟,导致户籍制度及其相关政策的改革。陈金永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人口迁移》,分析了户籍制度在控制城乡人口迁移中的作用,评述了从经济改革开始户籍政策的变化,讨论了这一制度改革中的主要问题和前景。宋洪远等的《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分别从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

政策的演变过程、输入地执行的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障碍、输出地的相关政策法规及其改革进程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进一步进行政策调整 and 改革的建议。赵延东、王奋宇的《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讨论了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情况,以及城乡流动者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其经济地位获得的显著作用,指出流动人口不仅面临着对原有的人力资本进行转换,使之能更好地在新的环境中发挥作用的问题,还面临着突破在乡土社会中形成的“原始社会资本”的束缚,建立新型社会资本的任务。蔡昉在更广泛的文献的基础上,对这个话题进行了综述。

第二编选择的论文分别就农村流动劳动者的特点、农村移民的经济解释和移民与劳动力市场的演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杜鹰的《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与宏观背景分析》,应用 1995 年四川、安徽两省调查数据,分析了 20 世纪 90 年代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人口特征、就业分布和社会特征。赵耀辉的《跳出农门:中国人口农村到城镇迁移决策》,使用 1994 年和 1995 年四川农村家庭调查数据,从家庭的层次分析了城乡移民问题,证明了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对迁移决策都很重要。孟昕、张俊森的《中国城镇的双层劳动力市场——上海城镇居民与农村移民的职业分割与工资差距》,研究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及城镇居民与农村移民的工资差异,表明统一的城镇劳动力市场仍未形成。宋丽娜和 Simon Appleton 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有权益阶层与无权益阶层的抗衡:寻求就业与政府干预》,考察了进城农民工是否在求职与报酬方面受到歧视。证据表明,进城农民工与城市下岗工人基本存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同空间。赵忠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完整的述评。

第三编选择的文章主要讨论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Alan de Brauw 等的《改革中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演变》研究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演化,乐观地表示农村劳动力市场正朝着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演化,而外出务工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最普遍形式。林毅夫等的《中国的地区不平等与劳动力转移》,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他们同时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收入差距。白南生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农业影响的研究》,利用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较多的四川和安徽两省的调查资料,通过对外出户与非外出户的比较,证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且在外出户的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资金对劳动的替代。李菁、姚洋的《平均的土地分配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研究现有土地制度及其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文章考察了拥有土地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现有制度造成的土地平均分配会鼓励劳动力的流动。都阳和 Albert Park 的《迁移、收入转移与减贫》,利用农户水平调查研究了中国贫困农村地区迁移与缓解贫困之间的关系,发现贫困地区的迁移表现出明显的临界变化特征,表明某些基本条件的缺陷制约了贫困家庭的迁移。白南生为这个主题撰写了评论性的综述。

第四编把视点放在流动妇女特殊问题上,重点讨论她们的婚育和生殖健康问题。郑真真等的《流动对农村妇女生殖健康状况的影响》,利用 2000 年在安徽和四川农村的调查,发现外出打工经历对农村妇女在婚育观念、生殖健康和避孕知识等方面有积极影响。王丰等的《上海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状况、知识与接受服务的研究》发现,流动妇女日渐增长的

健康服务需求,以及现实中她们在医疗机构受到的阻碍结合起来,已经导致了她们与当地妇女之间的显著差异。这样的劣势处境会影响她们的下一代,很可能又成为将来中国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之间不平等的基石。郑真真就这个话题进行了综述。

第五编意在介绍围绕劳动力流动进行的各种社会试验和国际经验与借鉴。韩嘉玲、占少华的《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工:中国经验》表明,农民工非政府组织处于发展初级阶段,数量少、力量弱、抗风险能力差,但其出现与发展却为中国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积极的经验。该文提出了进一步促进这类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都阳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国际经验》揭示了劳动力流动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介绍了迁移的国际经验和国外对中国迁移的研究,讨论了迁移研究的一般范式在中国的适用性。Kenneth Roberts 的《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变化情况》,在国际比较的框架中总结了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演变,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观察角度。

三、劳动力流动的发展和制度变革眼光

社会学和人口学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为经济学的同类研究提供的一个有益借鉴,是前者对本身的关注。这些学科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大都集中到具体的人群,甚至针对具体人群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要观察和理解一个特定的群体,深入的解剖无疑是重要的一环。但是,最终完成对这个群体的全面、历史的认识,并不能仅仅依靠在其静止的状态中进行分析,而要从历史关系中,将其作为一股历史流,放在特定、真实的背景中考察(Thompson, 1966)。劳动力流动现象以及流动中的劳动力群体,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事物,需要从发展的视角来认识和研究。

中国的城乡人口分布和劳动力流动状况,与其特有的户籍制度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办法来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林毅夫等,1999),办法之一就是扭曲农产品价格来压低城市的工资率。以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保证工业和城市的农产品供给,不可避免地要对农产品的收购和分配实行垄断,因而产生了统购统销政策。而为了防止农业中生产要素的转移,又诱致出集中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以及把城乡人口隔离开并限制迁移的户籍管理制度。这一系列制度安排,长期以来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这种对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造成了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产业就业结构的变化,城市化也严重滞后。改革以前,虽然国民经济产值构成发生了变化,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52年的57.7%下降到1978年的32.8%;就业结构的变化却大大滞后,农业劳动力比重从1952年的83.5%下降到1978年的70.5%。与此相应,1978年的城市化率只有17.9%,仅比1952年的水平(12.5%)提高了几个百分点。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及其劳动力格局,为改革后的劳动力转移积累起一个巨大的势能。

20世纪80年代初完成的家庭承包制改革,使农户成为他们边际劳动的剩余索取者,从而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而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对价格进行改革,诱导农民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在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后,非农产业活动更高的报酬吸引劳动力转移(Cook and Sarah, 1999),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市

场的发育,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农村一次性的改革效应释放完成时,城乡收入差距再次开始拉大。从那时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范围逐年扩大,新世纪以来呈加速趋势。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尚未完成,农村劳动力外出寻求非农就业,却不能同时实现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不充分的,也是不彻底的,从而形成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现象。2004年,离开本乡镇,且在外地居住超过1个月以上者,人数已经达到1.03亿。与此同时,按不变价格计算,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民人均收入的比率,从1988年的1.5提高到2003年的2.4。

可见,中国转轨时期的劳动力流动又是一种制度现象,它反映着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与农民作为制度需求者之间的博弈。户籍制度的继续存在,意味着城市偏向政策仍然没有寿终正寝,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为表征的“三农问题”,即是这种政策倾向的现实反映。制度变革的发生,最终取决于接受新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政治收益是否大于这种制度安排导致的政治成本,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的道理支配着这种制度的存在与消亡。

首先,农民对于一种制度从容忍到不能容忍,终究有一个转折点,最终导致制度变革。改革之前,中国农民处于一种贫困的恶性循环状态,1978年全国有2.5亿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借用经济史学的概念,当时农村经济处于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①。所谓低水平,是指农民收入长期在生存水平上下徘徊,并且在动态上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农民人均收入的2.6倍。所谓均衡陷阱,是指这种生存水平的收入具有一种制度决定的稳定性,假设任何一个向上的扰动,都会由于生产队集体劳动中激励问题的存在,而被重新拉回到出发点上。这种状况达到改革前很严重的状况时,以调整城乡关系,或者说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改革就发生了(周其仁,1994)。

农村改革一度曾大幅度地增加了农民收入,但是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很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城乡收入差距再次扩大,一直到目前,这个差距已经接近1978年的水平,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的2.4倍。我们可以把从那时以来很大一部分农村地区,看作是陷入了一个“温饱陷阱”的状态,或者相当于经济史中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状态。所谓高水平,是由于这时的农民收入,普遍的情况是在生存水平之上,或者说达到或超过了温饱水平。说它是一个均衡陷阱,是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足够大的力量打破这种收入水平的徘徊和差距扩大的局面,并且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正如我在《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一文中所预测的,当城乡收入差距再次扩大到1978年的水平时,制度变革的临界点就到来了。

其次,劳动力市场长期供求关系的变化,相应地带来不同群体对政策的影响力,从“数量悖论”到“供求法则”的转变,从而使城乡关系的均衡也发生变化。政府政策的城市偏

^① 关于“低水平均衡陷阱”和“高水平均衡陷阱”这两个概念,请参见: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ao Kang,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An Economic Analysi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向,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观察到。一个关于这种政策倾向形成的解释是所谓“数量悖论”。农民虽然人数众多,对于政策的影响却很小。这是因为农民因居住分散而导致的集体行动中过高的沟通成本,以及由于单个农民的产品只是农业产出的微小份额,容易造成的免费搭车现象,导致缺乏政治力量(M. Olson, 1965)。由此便形成农民人数众多而政治影响力微弱这种所谓的“数量悖论”(M. Olson, 1985)。而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份额相对下降规律的作用,当农民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相关政策的城市偏向就发生逆转(K. Anderson, 1995)。我们可以把这种转折看作是人口和劳动力比例关系影响政策倾向的“供求法则”(K. Anderson, 1995)。

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刘易斯式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但是,从最近在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可以判断,一个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转变正在发生(王德文等, 2005; 蔡昉, 2005),意味着局部性和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将会经常出现。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等现象,就是这个新趋势的端倪。通过劳动力“供求法则”的作用,一系列历史性的制度变化或者应运而生,或者开始在襁褓中孕育。总的趋势是,在立法、政府政策和工会作用等诸方面,从重视投资者而忽视劳动者逐渐转向尊重和保护劳动者权益。但是,这个制度变化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有时要经历艰苦的利益摩擦,甚至会发生社会冲突。

从上述两个逻辑和历史的分析来判断,中国已经到达了制度变革的转折点。这个转折时期的到来,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如果说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是打破农村贫困陷阱的关键性制度突破的话,这个新的旨在打破农村温饱陷阱的制度突破口,将是户籍制度为中心的、涉及城乡之间根本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因此,劳动力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且具有现实紧迫性的问题领域,就是户籍制度及其相关政策的改革时机、目标模式和操作步骤等。由于这个问题涉及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因此,这种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事先设计。

户籍制度及其相关的政策改革是一种制度变革,其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政府和社会认识到这种制度变革的净收益。在这方面,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的研究都各自具有智力优势。学者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可以揭示这种改革可能带来的好处,如资源重新配置导致效率提高,从而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性;劳动力流动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效应,对劳动力长期供给的正面影响,对人口结构的区域平衡的作用,等等。例如,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全部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世界银行, 2004)。Whalley and Zhang (2004)在假设户籍制度是劳动力迁移的唯一障碍的条件下,通过一项模拟表明,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对于劳动力迁移的障碍,现存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

此外,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包括:如何协调农民工与城市劳动者的关系,以及移民与城市原住民的关系;在一个公民自由迁移的条件下,城市治理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体系,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公共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在劳动力长期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是既适合中国国情,又

具有时代性和阶段性的，等等。回答这些学术挑战，必须是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在新的研究领域有大的进展，实现劳动力流动研究的集大成。

四、结 语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是一个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典型历史事件，为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提供了丰富且具挑战性的课题。劳动力流动既是一种发展现象，也是一种转轨现象，同样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从受到制度性抑制，到逐步获得社会同情和政策认同，乃至成为社会的常态甚至主流的完整过程。因此，这个研究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有与发展 and 改革相关的课题中，同时具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的最振奋人心的主题。

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社会科学成就的研究资源，不仅在于其所拥有的研究人力资本，更在于其所面对的问题的挑战性和历史价值。作为当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家，其幸运所在，恰恰是这种丰富的制度变迁现象及其学术挑战性，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时代意义，有更多的机会为人类知识积累做出较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所有这些理论课题，都是由现实所提出的，正确的理论解答可以直接转化为政策工具。这样的研究激励也是在其他国家、其他时代不可多得的。

参考文献

- [1] 蔡昉. 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吗?——劳动力市场新特征分析. 载: 刘国光, 王洛林, 李京文主编. 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5年春季报告.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5
- [2]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修订版).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3] 世界银行. 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分割: 经济成本和政策建议.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备忘录, 2004
- [4] 王德文, 蔡昉, 高文书. 全球化与中国国内劳动力流动: 新趋势与政策涵义. 载: 开放导报. 2005, 4
- [5] 周其仁. 中国农村改革: 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 载: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4(夏)
- [6] Cook, Sarah, 1999, *Surplus Labor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Agriculture: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Dat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5, No. 3, 16-44.
- [7] Joseph S. Berliner, *Internal Migration: A Comparative Disciplinary View*, in Alan A. Brown and Egon Neuberger (eds), *Internal Migr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San Francisco,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7.
- [8] K. Anderson, *Lobbying Incentives and the Pattern of Protection i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5, Vol. 43, No. 2, pp. 401-423.